

# 宋代馆券、驿券、仓券区别略论

——以东南地区馆、驿、仓设置为例

邹孟作

四川传媒学院 四川成都

**【摘要】**宋代“给券”不仅是官员俸禄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文武官员出差入朝过程中的食宿补给凭证，宋朝政府所给之券主要有馆券、驿券、仓券之分，三种券类按照等级高低排序为馆券、驿券、仓券，而宋政府对其等级的划分主要是依据馆驿所在的地理位置。馆多置于州城，驿多置于县镇，仓则州城县寨皆置。

**【关键词】**给券；馆券；驿券；仓券

**【收稿日期】**2024年8月9日 **【出刊日期】**2024年9月24日 **【DOI】**10.12208/j.ssr.20240019

**An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s guan vouchers, Yi vouchers, Cang vouchers: a case study of the establishments of guan, Yi, Cang in southeastern Chinese song dynasty**

*Mengzuo Zou*

*Sichuan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Giving- vouchers” (给券) was a component of officials' salaries and also served as meal and lodging subsidies for officials on business trips. The Song government primarily categorized the “Giving-vouchers” into three main types: Guan Vouchers (馆券), Yi Vouchers (驿券), Cang Vouchers (仓券). The three types of vouchers, ranked in order of hierarchy from highest to lowest are Guan Vouchers, Yi Vouchers, and Cang Vouchers.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se voucher types by the Song government was primarily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establishments where they were used. Guan (馆) were predominantly located in prefecture cities, Yi (驿) were mainly situated in county towns, and Cang (仓) were established in both prefecture cities, counties, and forts.

**【Keywords】** Giving- vouchers; Guan Vouchers; Yi Vouchers; Cang Vouchers

## 1 问题的提出

《宋史》将“给券”分在了俸禄制的门下，故其为官员俸禄的一种形式，但“给券”的职能又不限于此，“文武君臣奉使于外，藩郡入朝，皆往来备饗饩”<sup>[1]</sup>，其又作为文武官员出差入朝过程中的食宿补给凭证。“其赴任川峡者，给驿券，赴福建、广南者，所过给仓券，入本路给驿券，皆至任则止。车驾巡幸，群臣扈从者，中书枢密三司使给馆券，余官给仓券”<sup>[1]</sup>。可见“给券”按种类可分为：驿券、馆券、仓券三种。此外，根据臣僚所出地域的不同以及官

职的高低将所给之券分了不同等级。馆券、驿券与仓券的共同之处在于皆可用作为旅途补给凭证。那么三者的区别在于何处？曹家齐先生指出“仓券是在州县粮仓或者驿官支取粮食的凭证，馆券大概只能在馆驿食宿或只能支取食物，当不能支取钱粮，否则即与驿券和仓券无异，但对其发放的具体内容，有待于进一步探讨”<sup>[2]</sup>。故笔者试以《宋史》所述“给券”种类为基础，略论宋代馆券、驿券、仓券的区别。

## 2 馆券、驿券、仓券之别

《宋史》载“群臣扈从者，中书、枢密、三司使

作者简介：邹孟作（1993-），女，四川崇州人，历史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

给馆券，余官给仓券”可知馆券的等级应该较仓券更高。要了解馆券、驿券、仓券之差别或许可以从馆、驿、仓之建置来思考。关于宋代馆、驿、仓之设置多见于方志中，而宋代今存州县方志仅 29 种，其中撰于北宋仅两种<sup>[3]</sup>，其余皆为南宋撰写，多集中在今我国东南地区，故本文主要以东南地区馆、驿、仓设置来论述。例如《淳熙三山志》，其对驿铺有记载：

在福州城中，有使星馆，位于海晏门内；迎仙馆，位于南禅寺东；崇轺驿，位于南门内；如归馆，位于威武军门外；皇华馆，位于还珠门外。

在福州城西路有迎恩馆，位于旧迎仙门外之南；东门铺，东取州城半里西取土堰十八里；土堰铺，西取葛崎铺十八里。葛崎驿，位于怀安县北取州六十里；葛崎铺，西取陈湖二十里；陈湖铺，西取丰田二十里；丰田铺，西取大濑二十里。大濑驿，位于候官县保安里距城九十里；大濑铺，西取汤背三十里；汤背铺，西取小若二十五里；小若驿，位于闽清县东北五里；小若铺，西取嵩滩二十五里；嵩滩铺，北取常濑铺二十五里；常濑铺，西取朱坑十五里。高溪驿，位于古田县南九十里水口镇；朱坑铺西取芋洋三十里；芋洋铺，西取使华亭二十里又十里至营顶。使华亭，地名黄日，宣和六年创为星轺食息之所；营顶铺，西取南剑界首五里，又八里至武步，去金沙六十里，金沙至南叙五十里。

在福州南路有横山铺，距州南九里，取江南铺十五里。临津馆，唐时名南台；江南铺，取方北十五里。西峡北驿，名济川北馆；方北铺，南取方南隔江折二十里；方南铺，南取大田铺二十里。西峡南驿；大田铺，南取常思二十三里。大义临津驿；常思铺，取太平七里。太平驿，位于福清县西；太平铺，南取假面十七里；假面铺，南取渔溪十八里。渔溪驿；渔溪铺，南取蒜岭二十三里；蒜岭铺，南至莆田县界三里，至迎仙二十八里至兴化军五十里。<sup>[4]7827-7832</sup>

福州城中有馆四，有驿一，分别是使星馆、迎仙馆、如归馆、皇华馆、崇轺驿，馆置在城中的占比为 75%。此外，福州西路有迎恩馆一个；福州南路有临津馆一个，且此两馆作为食宿补给点来说的话，距城中心地区最近。

《淳熙三山志》所载福州城与西路、南路的驿，共十个，笔者将各驿整理成表，如表 1：

根据表 1，福州城和福州西路与福州南路共有驿十个，其中史料明确记载了其所在地的为六个，其中一个驿置于州城之中，四个驿皆置在县中，一个置于镇中，根据图中所示，驿置于县中的比率为 66.6%，或许可推其余四个未说明其具体所在地的西峡北驿、西峡南驿、大义临津驿、渔溪驿也有极大可能设置于县中。由此则或许可说明宋代福州的驿站普遍设置于县之中。

此外，《嘉泰会稽志》之中也对宋时期绍兴地区的馆、驿有所记载：

“城府：蓬莱馆在卧龙山之左。子城东门有丰宜馆。

诸县：山阴县有仁风驿在县北三里，柯桥驿在县西二十五里，钱清驿在县北五十里；剡县有访戴驿在县东南二十五步；诸暨县有使华馆在县东百六十步，枫桥驿在县北五十里；萧山县有梦笔驿在县东北百三十步，萧山馆在县西北百二十步，日边驿在县西一十二里，渔铺驿在县南三十六里；上虞县有金罍驿在县东二百步，池湖驿在县西南五十里；新昌县有南明驿在县西一百步，天姥驿在县东南五十里”<sup>[5]6779-6780</sup>。

综上，笔者将绍兴府属县的馆驿分布情况整理为表格，进一步分析见表 2：

绍兴府城之中有馆两个，无驿。馆置于城中的所占比为 100%。在诸县，绍兴府属县之中共置有馆二个：“诸暨县有使华馆在县东百六十步”、“萧山馆在县西北百二十步”，所占比例为 14%，有驿十二个，所占比约是 86%。如果按照距离（步、里）远近来统计绍兴府属县所设置的馆驿的话，那么在县之中以步数计算距离的馆有二，所占比为 100%，可见两馆虽然置于县中，但是其位置是距离县中心地区较近的，位置相对优越。在县之中以步数来计算距离的驿有四，说占比约为 33%；在县之中以里来计算距离的驿有八，所占比约为 67%，可见在县中，驿所在的距离普遍比馆要离县中心远。综上所述或许可以说明宋代绍兴府的馆普遍是置于城中，驿站普遍设置于县之中；如馆设置于县中，那么其地理位置普遍比驿所在的位置更加优越，距离中心地带更近。

此外，《淳熙严州图经》也对严州的部分馆驿有

所记载见表 3:

“城社罗成周回十二里二步，城有八门，东曰望云，南曰定川，曰安流；西曰安泰，曰和平；北曰嘉熙；东北曰百顺；西南曰善利。子城周回三里<sup>[6]</sup>4287。

公馆在子城东山下；如归馆在子城东门内南偏以待

寓客；定川馆在定川门外临歙江以待往来舩舟者；东馆在东津，旧有东馆楼，钱文肃公更其名曰，分歙（江）……以今名待往来舩舟不至城下者。西馆在安泰门外，新定驿旧在南门外，今废”<sup>[6]</sup>4289。

表 1 福州南路驿、西路驿分布表

驿名	崇轺驿	葛崎驿	大濼驿	小若驿	太平驿	高溪驿	西陕南驿	大义临津驿	西陕北驿	渔溪驿
所在地	南门内	怀安县	候官县	闽清县	福清县	水口镇	/	/	/	/
行政区划	城	县	县	县	县	镇	/	/	/	/
比率	16.7%	66.6%				16.7%	/	/	/	/

表 2 绍兴府馆驿分布表

馆驿名	蓬莱馆	丰宣馆	使华馆	萧山馆	仁风驿	柯桥驿	钱清驿	访戴驿	枫桥驿	梦笔驿	日边驿	渔铺驿	金壘驿	池湖驿	南明驿	天姥驿
所在地	绍兴府城	绍兴府子城	诸暨县	萧山县	山阴县			剡县	诸暨县	萧山县			上虞县		新昌县	
区划	城		县													
距离	卧龙山之左	子城东门	在县东 160 步	在县西北 120 步	在县北 3 里	在县西 25 里	在县北 50 里	在县东南 25 步	在县北 50 里	在县东北 130 步	在县西 12 里	在县南 36 里	在县东 200 步	在县西南 50 里	在县西 100 步	在县东南 50 里
数量	馆	2	2		/											
	驿	/	/		12											
	步	/	2		4											
	里	/	/		8											

表 3 严州馆驿分布表

馆驿	公馆	如归馆	定川馆	东馆	西馆	新定驿
所在地	严州子城	子城东门外	定川门外	东津	安泰门外	南门外
区划	城					
比率	83%					17%

在宋朝时期严州城置五馆：公馆、如归馆、定川馆、东馆、西馆。一驿：新定驿<sup>1</sup>。在城中和城周围置馆的比率为 83%，置驿的比率为 17%。如果不将当时已经废除的新定驿计算在内的话，那么严州城的置馆比为 100%。可见在宋代严州也是普遍将馆置于城中和离城较近的地带。

宋代城市在坊市制的消失之后，逐渐由传统的中古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兼具中古城市政治功能显著、消费色彩突出和作为一定区域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信息及娱乐中心的近代城市的特点<sup>[7]</sup>。馆与驿的差别在于馆多设置于州城之中或离州城较近

的地带，所处的地理位置则决定了其条件的好坏，所以位于普遍设置于城中以及距城较近的馆其设施和食货条件应该与普遍设置在县中的驿相比应该会好很多，《东京梦华录》载开封城内“十字街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籙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其下贩鹰鹞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姝房……”<sup>[8]</sup>，何其繁华。故馆所

<sup>1</sup> 新定驿在宋代后期被废，史料中对于新定驿的记载较少，不知其是否在宋朝时期使用过。

在地理位置最为优越，则馆券与驿券相比，馆券的等级应更高，使用馆券或许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优待。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载“天圣三年（1025）秋八月，蠲责益州举人馆券”<sup>[9]</sup>。此次事件在按语之中写得很清楚，是因为自张咏守益州以来，皆给馆券与举人至京师，到了薛田任知州后，三司移文乃责偿于吏，上曰：汉贡士续食施于郡国，今独不能行之于远方耶？于是悉蠲之。在开宝二年（970）便诏令“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举人，往来给券”<sup>[10]</sup>。对于四川举人进京，确会给券以作为补贴，为何张咏给与举人馆券会被三司责偿？《宋会要辑稿》载“知益州薛田言‘本州解举人，依例支給驿券’”<sup>[11]</sup>。按例，益州所发放与举人的为驿券。《会稽志》也载“贡士皆给驿券”<sup>[5]6726</sup>，故举人往来补给多给驿券。由此，张咏给馆券与益州举人，被三司责偿，或许是因为其所给“馆券”超出了原本的规定“驿券”等级。

故笔者认为曹家齐先生所谓“馆券大概只能在馆驿食宿或只能支取食物，当不能支取钱粮”的观点，或许有误，如上文所述馆券等级更高的话，那么驿券所能行使的职能，馆券必然也能行使且使用馆券应能获得更多的优待，但是具体哪方面的优待，还有待探究。

宋朝对于仓司的设置更为普遍。州、县仓都建在州、县治所在地<sup>[12]</sup>。此外，在一些镇、寨，也有仓的建置，《淳熙三山志》载福州：

“州都仓，旧名西版仓，闽王审知创于城外”<sup>[4]7852</sup>，“省仓者，咸平四年（1001）始置。初诸邑输米悉移都仓，至是大理寺丞马易从奏诸郡外县合销粮草，令顺使受纳，于是赖各置仓，闽、侯官、怀安以倚郭不置，余九县皆置。连江、永福皆县内之西；福清县门外之右；长乐去县西半里；长溪县之东南；罗源、宁德皆在县中……古田、闽清皆在县侧……其后水口、鸡菜两镇置寨又分两仓，几十一所”<sup>[4]7873-7874</sup>。

此外，《咸淳毗陵志》载常州：

“余纳仓在州桥南街东，绍兴四年俞守侯始创三廩……无锡省仓在县南，常平仓在省仓西；宜兴苗仓在县城门西，麦仓在县城门东，常平仓在通直观前”<sup>[13]</sup>。

《淳熙临安志》载临安府：

“省仓上界在天水院桥北即中兴初之南仓，绍兴二十一年诏以省仓上界为名……省仓中界在青门外菜市塘，省仓下界在东仓铺，丰储仓在仁和县侧仓桥东，丰储西仓在余杭门外左家桥北，端平仓在余杭门外德胜桥东，淳祐仓在余杭门外内科桥南，平余仓在东青门内后君寨北”<sup>[14]</sup>。

宋代东南地区的州府、县、寨皆会置仓以便使用。关于仓券，《天圣令》载：“其征行及使应合给粮者，仍令所司具录姓名为券，所在仓司随给，不在隔限。其杂畜料，亦准此”<sup>[15]</sup>。军队外出征行、官员出使等，由所属官司发给仓券等凭证，于所到之处的仓司支请口粮和杂畜料。《庆元条法事类》载：“诸在任官身亡，赴罢在道或干公事同，以报到日问其家良、贱口数并赏计程数给仓券，不得过五十程，于所在州县，非在京，出粮审院支帖一并支給，若不为勘给，许经监司陈诉”<sup>[16]</sup>，故而仓券应该仅是在州县镇寨仓廩支取粮食的凭证，与驿券和馆券不同的是，仓券不能用于借宿。

综上，馆多设置于州城之中或离州城不远的地方，馆偶尔设置于县上，置于县中的馆距离县中心区与驿相比较近，且等级较驿更高；驿多设置于县，偶尔设置于州城和镇上，但是置在州城的驿数量较少；仓司所在地较广，州、县、镇、寨皆置，所以其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由于仓券仅仅能兑换食粮，所以给券按照等顺序级划分的话，由高到低应该是馆券、驿券、仓券。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梳理史料时发现对驿券的史料记载最多，而馆券和仓券的记载最少，曹家齐先生也指出“宋代官员出行，以发放驿券者最为普遍，且有驿券则例，而不见有馆券则例和仓券则例”<sup>[2]36</sup>。《宋会要辑稿》载“自来密院出给驿券，水路省司出给历头”<sup>[1]3140</sup>，可见驿券由枢密院发行。而馆券之发行，据前文所述“三司移文责益州举人偿馆券于吏”，应该与三司有关。最低等级的仓券，《天圣令》载：“其征行及使应合给粮者，仍令所司具录姓名为券，所在仓司随给”，可知仓券应该是由需要领取食粮的出差人员其所在部门来录姓名发券，也就是说发行仓券的部门较三司与枢密院相比，其等级是最低的，随机性也较大，故而被史官记载存入史籍的几率最小。而馆券则是因为馆本身多设置在城中，其数量本身较少，而馆券的使用者也多为

中书、枢密、三司使等高级中枢官员，其使用者也较少，所以史料对于馆券的使用记录也较少。

### 参考文献

- [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4145.
- [2]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35-36.
- [3] 顾宏义.宋朝方志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
- [4]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7827-7874.
- [5] 沈作宾修,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6726-6780.
- [6] 陈公亮修,刘文富撰.淳熙严州图经[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4287-4289.
- [7] 刘树友.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考察——以夷坚志为中心[J].陕西历史博物馆丛论,2018(25):194-204.
- [8]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4.
- [9]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6:183.
- [1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232.
- [11] 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2014:3140,5546.
- [12] 杨芳.宋代州县仓收支述论[J].西北大学学报,2012(3):108-112.
- [13]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3001-3002.
- [14]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3436-3437.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代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278.
- [16] 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90:156.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